



聽覺的木馬屠城：北京如何以「廣播型認知戰」洗台灣人的腦？

●譚偉恩／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當前關於「認知戰」的研究集中於數位媒體與社群平台，忽略了傳統媒介在「認知戰」所具有之戰略價值。本文針對「廣播型認知戰」進行探討，指出中國對台廣播之影響力並非源於其內容，而係來自地理空間、傳播屬性與台灣的制度結構。藉由「物理層—制度層—認知層」的綜合分析，揭露中國對台廣播如何透過嵌入民眾日常生活與非排它性接觸，對聽者形成長期的認知滲透。由於地理位置與傳播方式對台灣構成先天性劣勢，加上台灣後天的媒體規範機制重視人民知的權利和表意自由，導致回應中國「廣播型認知戰」時易處於不利之地位。

壹、前言

各國對於假訊息與認知戰的討論已是汗牛充棟，但多聚焦於社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影響力，以及數位資訊生態的普及。然而，此種「數位中心論」（digital-centric）的視角忽略了一項關鍵事實，即傳統媒介，特別是「廣播」，在特定條件下仍具有高度的戰略效益。¹中國近年持續對台灣進行之「廣播型認知戰」，即是一個值得重視但卻被低估的案例。

在數位媒體高度發展的二十一世紀，傳統的廣播為何仍能成為威權政體進行認知戰的利器？本文認為，答案不在於廣播本身是否有高科技的加持，而在於廣播是否將自己有效地嵌入「空間政治」，並精準地對適格的聽眾群進行「習慣化」與「累積式干擾」。換言之，廣播可以作為一種空間化的認知戰工具，透過電磁訊號的傳遞，匿蹤又無聲地進入聽者的生活場域，並在可見性極低卻長期累積的情況下，對聽者形成意識與思維之建構。

台灣因地理位置上與中國鄰近，加上民主體制重視人民的表意自由，媒體開放程度高，資訊管制的密度低，不知不覺便居於認知戰中之劣勢。本文藉由「物理層—制度層—認知層」的綜合分析視野，說明北京對台廣播何以具有木馬屠城的風險，以及人民和政府可以做些什麼來降低目前面臨之困境。

貳、「空間—制度—認知」的整合觀察

政治傳播的文獻對於假訊息之觀察或分析多集中於當前流行的各類社群媒體或「混合媒介系統」，探究它們如何成為假訊息的發送或轉載點，雖然有一些研究者認為傳統媒體（例如：電視或廣播）並未被全面取代，但無論是實證或理論研究的重心仍將「數位化」與假訊息緊緊聯繫在一起，忽略非數位化平台的角色和影響力。²其次，銳實力（sharp power）的文獻嘗試說明威權政體如何滲透民主社會，但個案分析多聚焦於媒體策略、制度滲透與權力投射的多樣化，鮮有對傳播媒介本身的物理特性進行探討。有鑑於此，本文嘗試透過「空間—制度—認知」的整合視角，來說明「廣播型認知戰」如何對台灣國家安全構成影響。

首先，廣播的「投射空間」容易被忽略，但這恰好是它作為認知戰工具的一項物理優勢。廣播的內容是透過電磁波進行傳遞，因此其跨境能力與網際網路不同，如果選擇用振幅調變（Amplitude Modulation, AM）之方式來傳送無線電訊號，便能藉由大氣層內的電離層來輸送聲波，並且在傍晚以後可獲得較佳效果，延展訊號投射之物理距離。中國在東海沿海的諸多廣播發射站便是選用AM方式對我國不特定之多數接收者傳達特定內容，以相對低成本實現高覆蓋，構成「訊號可達性之不對稱」，侵佔台灣領域內的電磁空間，而我方難以阻斷攔截。³

其次，在民主國家，政府對資訊內容的管制必須依據法律，因為表意和言論自由裨益溝通意見、追求真理，以及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對促成公意與促進合理的社會活動至為關鍵（釋字第509號）。⁴在此前提下，民主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社會開放性與人民多元化，不可能恣意使用法律對廣播活動進行控制，卻也因而承受境外廣播的滲透，陷入民主社會「內部被裂解」的風險中。瑞典的民主多樣性研究中心（Varieties of Democracy Institute）曾在書面報告中指出，台灣是全球少數有超過十年以上被境外假訊息大量「攻擊」的國家。

第三，收聽廣播其實和使用手機一樣，是種高度習慣或會成癮的行為，非常如易嵌入個人日常生活，如駕／坐車、慢跑、打掃、煮飯、農作等。此種利用聲音匿蹤，但以載波（carrier wave）進行傳輸資訊的模式，讓廣播的影響呈現累積性。毋寧，廣播內容的說服力或可信度不需要很強，其真正的影響是藉由與聽者長期接觸，逐步融為其習慣之一部分，從而產生干擾聽者認知的效果。

綜上所述，廣播在認知作戰中頗具優勢，因其覆蓋範圍高度取決於客觀之物理條件，收聽者的選擇空間或彈性有限。此外，廣播具有「非排它性接觸」的特性，只要收聽者處於訊號範圍內，即可能成為非自願之訊息接收者。另一方面，廣播主打聽覺，可被觀測性極低，此點有別於數位平台；易言之，廣播缺乏數據軌跡，不易被肉眼監測、判定和分析，增加諸多執法與歸因上的不確定性。⁵再者，以投射資訊為主的「廣播型認

知戰」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到可以滲透的「弱脆點」。由於像計程車司機或長途運送客／貨之駕駛員，長期處於相對密閉空間，特別仰賴廣播調適自我情緒與轉移工作壓力。此時，廣播對接收者的「伴隨性」就與其內容之滲透力形成加乘效應。曾有文獻指出，當個體處於行為重覆操作的階段（例如：組裝產品、慢跑），大腦的資訊處理機制就會進入「穩定模式」，以低耗能的思維保持重覆性動作的穩定，此時聽覺所接收到的外部資訊會較少被大腦進行「檢驗」。⁶中國對台的廣播統戰便是藉由此種接收者心智處於「低涉入」（low-involvement）的狀態，將政治敘事鑲嵌在廣播中的廣告或談話性內容中，對聽眾的潛意識進行「洗腦」，對於長時間執行重覆作業任務的勞動者來說，廣播形同一種「聽覺陪伴」，不僅具有心理性的情緒功能，還隨著接收者聆聽時間的習慣化，建構聽者的情感依賴，進而使聽者淪為「木馬屠城的俘虜」。

參、結語：如何反制意不在酒的醉翁？

中國「廣播型認知戰」的真正目標是達成戰略上「分裂」台灣民主社會的效果，而非政治上「爭取」台灣百姓的認同。簡言之，統戰廣播的核心任務不是行銷北京當局的豐功偉業或是習近平力推的「中國夢」，而是催化台灣內部的矛盾（如族群、世代、政黨、階級等差異）。其最終用意是干擾不特定多數台灣民眾的認知，使人民對我國的民主制度產生懷疑，對政府的治理喪失信心。

面臨這樣嚴峻的挑戰，反制「廣播型認知戰」就並非單純的傳播科技與資訊規範議題，而是必須體悟到中國採用這樣的統戰技倆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也就是本文提出之「空間—制度—認知」的疊加效應。台灣由於地理上鄰近中國，不可逆地淪為空間政治上的劣勢方。其次，屬性開放的民主媒體制度限縮了政府對境外資訊侵佔台灣電磁空間的防禦力，導致我國長期成為境外假訊息攻擊之對象。「廣播型認知戰」鎖定台灣在地的脆弱點群體，透過包裝式的內容融入勞動圈與民生層，達到累積性存在的影響力，相當難以阻絕。

有鑑於此，本文建議：（一）交通部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評估在相同或相近頻段，增加我國優質廣播（如警廣、教育廣播）的功率與播送，對中國的廣播形成空間政治上的物理性反制。此外，政府相關部門可以考慮推動「廣播數位化」，利用數位音訊廣播（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技術，提供高音質、無噪音、抗干擾的新世代廣播生態，從而降低國人接受AM訊號的比例。

（二）推動社會層次的「媒體識讀」，提升國人解讀資訊和辨識真假的能力，傳播學領域已開始討論訊息流行病（infodemic）與接種理論（inoculation theory），強調藉由識讀教育的落實，培養接收者對資訊本身的邏輯謬誤具有一定的反思力、反制力和反省力。⁷

（三）地方政府可與計程車工會或不同的勞動團體合作，開發屬於「運將社群」或

以勞動者需求為導向的Podcast，內容涵蓋職業資訊、就業和轉職管道、即時路況與天氣預報等，以在地的優質廣播內容來反制「彼岸統戰性之惡假害敘事」。

面對中共威權政體跨境投射之「廣播型認知戰」，台灣應意識到這是一種精密且旨在裂解我們民主社會的統戰技倆。職是之故，捍衛民主台灣的「聽覺主權」，不讓人民成為木馬屠城的「聽覺俘虜」；空間上，台灣應該啟動扭轉物理劣勢的政策，制度上仍應堅持對人民資訊權的捍衛，但積極展開認知層面的反制行動，透過傳播韌性與媒體素養，將中國的統戰降級為無效之噪音。

【註釋】

1. Carlos Diaz Ruiz, “Disinformation on Digital Media Platforms: A Market-shaping Approach,”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7, No. 4 (2025), pp.2188-2211; E. Aïmeur, S. Amri & G. Brassard, “Fake News, 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in Social Media: A Review,”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Mining*, Vol. 13, No. 30, 2023, <<https://doi.org/10.1007/s13278-023-01028-5>>.
2. Marija Gombar, “Algorithmic Manipul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Media Theories and Cognitive Warfare i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Vol. 4, No. 2, 2025, pp.1-11; Tarnveer Singh, *Digital Psychological Warfare: Weaponis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6).
3. 台灣西部沿海或山區中的特定族群或聚落，因為在振頻調變（Frequency Modulation, FM）的訊號接受能力較弱，以致很多時候只能接收到 AM 訊號，而 AM 訊號是目前中國廣播式認知戰偏好採用的路徑，因為電磁波具有較強之繞射能力（diffraction）與遠程傳播性，如果再加上大功率的發射台，就可以對海峽彼端的台灣長時間投送特定內容之資訊。
4. 類似見解可參考：劉定基，〈網路平台時代的假訊息管制—傳統言論自由理論過時了嗎？〉，《憲政時代》，第 47 卷第 3 期，2023 年，頁 445-482。
5. 譚偉恩，〈藏魔於巧，隱身於音：論中共統戰廣播的本質及影響〉，《清流雙月刊》，第 47 期，2023 年，頁 4-10。
6. Russell B. Clayton,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emporal Comparisons and Reminiscing on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Music and Radio Advertisement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Vol. 65, No. 1, 2021, pp.88-110.
7. Jon Roozenbeek, et al., “Psychological Inoculation Improves Resilience against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Science Advances*, Vol. 8, No. 34, 2022, pp.1-11.◆